

# 太忻两地文化探析

张斯直

太原和忻州文化源远流长，独具魅力，蕴藏在两地的自然山水和人民群众的活之中，并且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形成新的文化内涵。

**山水相连的地域文化。**太原和忻州山水相连，特别是太原的阳曲县和忻州市的忻府区，两地仅以系舟山相隔，地质地貌、地层剖面、土壤结构、树木花草、禽畜种类等都十分接近。《忻州市地名录》载：“牧马河又名七岭河……该河系滹沱河流域，发源于阳曲县六固村上端的管子沟，到忻州市西南的白马山至牛尾庄汇合诸水，到定襄县陈家沟西北汇入滹沱河，全长118.3公里。”这样的地理特点，造就了相同或相近的地域文化。

《隋书·地理志》载：“雁门、马邑、定襄，接连边郡，习尚与太原同俗，人性劲悍，习于戎马。”据《忻州直隶州志》载：“忻州气禀刚劲。”从这里可以看出，太原和忻州两地人民性格有相似的地方。

**血浓于水的乡梓文化。**太原和忻州两地同属于中国黄河文明，其中太原偏向汾河文明，忻州偏向牧马河、云中河和滹沱河文明。从历史上看，太原，古属冀州，忻州也是；太原春秋属晋，忻州也是；太原战国属赵，忻州也是；秦、汉时太原建制为郡，忻州隶属太原郡管辖；唐代中期，太原置河东节度使，忻州属太原管辖；金元时太原属冀宁道管辖，忻州也是；明清太原置太原府，管辖忻州。可以看出，忻州（这里特指忻府区）在历史上的大部分时间里，都属于太原管辖，是太原的一个基本行政单位。

正因为在地域上相连，管辖上从属（忻州从属太原），所以造就了两地人民的频繁交往，而这交往不仅仅体现在两地民间的商贸和经济上，还体现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

面。长而久之，通过密切往来，太原和忻州两地人民增进了感情，加深了友谊，都把对方看成自己的乡亲，这种相亲相近的感情，造就了数千年来血浓于水、牢不可破的乡梓文化，在两地民间广泛流传。

**荣辱与共的社会文化。**忻州和太原山体相连，仅隔石岭关和赤塘关。石岭关和赤塘关南即是太原，北即是忻州。忻州晋北锁钥，对于太原的拱卫十分重要。古往今来，太原与忻州荣损一体，可以说是牵一地而动两地。

宋宣和七年（1125）12月，金国左路军元帅完颜宗翰带领两万金军先后攻克朔州、神池、代县，进逼忻州和太原，遭到忻州和太原军民顽强抵抗，当金兵攻陷忻州时，忻州作为拱卫太原的北大门洞开，太原也就失去了防卫能力，随即被金军攻破。忻州、太原此后归金国统治。

金宣宗贞祐二年（1214），元蒙军队在大将木华黎的率领下，攻打忻州和太原，期间忻州和太原部分百姓，避兵阳曲县北山。当蒙军攻陷忻州后，太原也无险可守，随即被攻破。在这两场大规模战役中，太原和忻州两地军民，都进行了奋勇抵抗，体现了太原和忻州两地人民同仇敌忾、誓死保卫家乡的可贵精神。

1948年7月忻州解放后，忻州人民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为解放太原开展了大规模的支前运动，忻州儿女走上前线，有力地支持了太原解放，彰显了太原、忻州人民血脉相连的深厚感情。

**和衷共济的诚信文化。**从古至今，太原的存在和发展一直离不开忻州，而忻州的发展和壮大，更离不开太原。忻州是太原的经济发展基地之一，是太原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之一；而太原是忻州经济和社会发展

的重要依靠，两地互相配合，相互支持，共同发展，共同进步。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忻州就是赵国的封地，为抵抗侵略，赵国需要大量马匹，忻州利用牧马河畔草木肥美的优势，常年给赵国提供马匹，同时还为赵国提供将士、粮食；明清时期，忻州商人发展壮大，北上俄罗斯、西到中东，赢得了忻商辉煌，成为晋商的一支重要力量，这时商业成为太原、忻州两地人民沟通的重要方式；清朝晚期，太原成立晋阳书院和令德书院，忻州考中秀才的学子奔赴太原学习深造，有的考中举人，有的考中进士，太原成为忻州学子学习、走向仕途的一个重要平台。就在今天，许多太原人民吃的土特产、建筑所需的材料等，有不少是由忻州运送，而太原也在就业、教育、医疗、科技等方面，为忻州人民提供了便利条件。两地在长期的交流交往中形成了互相依靠、互相支持、互相商谈、互相信赖的诚信文化，促进了两地经济的繁荣、社会的进步、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缤纷多姿的民俗文化。**民俗文化具有长期性、广泛性、多元性和传承性等特点。太原和忻州两地有好多民俗文化的种类和特点基本相同或相近，如在农耕、商贸、民居建筑、生辰寿诞、岁时节日、婚丧嫁娶、衣装服饰、饮食起居、礼仪交际、日用器具、文化娱乐、戏曲音乐（晋剧、二人台）、儿童游艺、庙会举办等方面，有很多相同的地方。这里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历朝历代不断有大量忻州人来到太原工作生活，有的在太原定居，成为太原人。这样就把忻州的生活习惯、兴趣爱好等带到了太原，并在太原得到传承。

## 祁县盘陀古村

杨子银 薛林平



盘陀村鸟瞰 图片由作者提供）

晋中市祁县，古为“川陕通衢”，是古代万里茶道上的物流、转运、集散中心。当地的传统村落是万里茶道的重要载体，位于祁县县城东南太岳山北麓的盘陀村就是古时的一处驿站。

盘陀村东靠九龙山，正对面群山层叠叠嶂、连绵不断，当地人称龙虎山，隐约有龙虎争斗之意境，更有藏龙卧虎之遐想。

这座村庄历史悠久，相传三国时期关羽曾来到此地的杆树下盘坐拜佛，故村落得名“盘陀”。另一说法源于盘陀山，据明嘉靖十四年（1535）进士、曾任督晋学政的鄢陵人陈棐所写《盘陀山石堂记》载：“晋阳之南百余里即多山，有山名盘陀，变名千佛……命祁李尹凿石堂于兔之左……”陈棐所记的盘陀山，即位于村西昌源河西畔的西山北端。

因其重要的地理位置，历朝历代均在此设官驿，以供来往官员和情报传递人员途中食宿换马之用。明清时期，驿站规模扩大，盘陀村逐渐成为万里茶道的重要节点。

东靠九龙山，西对龙虎山的地理格局，以及两山间的昌源河为盘陀村人带来了勃勃生机。在此环境下，村落古建筑群建于丘陵与平原的交界地带，整个村落阶梯状逐级递减呈三级阶面，东部高，西部低，中部则介于台地与平面之间，全部错落在宽敞的坪地上。



阳城烧肝是晋城市阳城县地方名吃。以鲜猪肝加佐料，用猪花油包卷，经煎、蒸、炸等工序至焦黄酥软即成。其特点是外焦里脆，味美适口，热食不腻。

关于阳城烧肝的来历，有一个传说。很久以前，阳城县有个姓甘的县丞，他巧取豪夺，搞得当地民不聊生。南城墙上住着郝氏三兄弟，老大以杀猪、卖肉为生，老二以卖菜为业，老三从小好读书，是城内少有的才子。隆冬晚间，有王屋山下的学友来访，老三因家中米无半粒、菜无片叶，无以招待。去老大家讨些肉食，无奈老大家只剩半叶猪肝，转到老二家，老二家的菜已卖尽，筐中只有几瓣大蒜。

## 萦曲千载羊肠坂

刘庆庆

从晋城市区南行约30公里，来到晋豫交界的泽州县晋庙铺镇。沟谷幽深和立壁峥嵘之间，有一条蜿蜒逼仄的古道，花丛中掩映着一块长方形的磐石，上面从右至左雕刻着四个磨盘大的字：“古羊肠坂”。

羊肠坂，因石道萦曲盘旋如羊肠而得名，它地偏却名声在外。《史记》中对它有多处记载。《魏世家》中说的“昔者魏伐赵，断羊肠，拔阙与”和《蔡泽传》里的“决羊肠之险，塞太行之道”皆指此。《魏世家》里说得更明白：“羊肠坂道在太行山上，南口怀州（今河南沁阳市），北口潞州（今山西长治市）。”《大清一统志·泽州府·山川》指出，战国所言羊肠当指后者，即古泽州的羊肠坂道。

“古羊肠坂”南起河南焦作沁阳市常平村，北抵山西晋城市泽州县碗村一段，全长约4千米，是太行险最险要的路段，古时辖京洛要道之咽喉，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

回望历史，让羊肠古道声名远播的是魏武挥鞭，西行羊肠有遗篇。那是在东汉建安十一年（206），一代枭雄曹操顶风冒雪率师北上作战，在翻越太行山羊肠坂途中写成了千古绝唱《苦寒行》。其中“北上太行山，艰哉何巍巍！羊肠坂诘屈，车轮为之摧”的诗句，广为传诵。诗中咏叹太行山羊肠坂道路凶险，行军艰苦，为了平定北方，这“虎豹夹路”承载着历史的厚重和将士的使命。

羊肠坂背倚巍巍太行上党，面对莽莽辽阔中原，周边有众多军事设施。最为著名的是距“古羊肠坂”摩崖石刻仅数十米的碗子城。碗子城是太行陞羊肠坂道上的一处关隘，由唐代大将郭子仪率领兵士所建，也是历代镇守天井关的驻兵地之一。

晋城位于山西南部的太行山尽头，横亘于此的羊肠坂古道战时是“兵要首地”，平时则是“商旅通衢”。宋太平兴国二年（977）编纂《太平广记》讲了一则故事：“唐龙朔元年（661），怀州（今河南沁阳）有人至潞州（今长治）市猪至怀州卖。有一特猪，潞州三百钱买，将至怀州，卖与屠家，得六百钱。”可见这条古道很早就扮演了加速商品货物流通的角色。

宋代对北辽、西夏的战争，使羊肠坂所在的太行道的地位急剧上升，扼守太行的晋城成为京都汴梁的门户、雁门三关的保障。在解决边关将士补给的同时，也激发了商人运送粮草、换取盐引、开展贸易的欲望。历来生活艰苦的太行山人有熟山道、识边关、懂粮草的天时地利和智慧，很快就成为这支贸易队伍的中坚，组成了最早的泽州商帮。明清五百年间，太行道成为泽潞地区的重要商道。

帝王武将过，文人骚客行。据统计，登临路过羊肠坂的古代帝王有13位，著名将领、大臣、文学家、史学家和文人墨客达上百位。他们触景生情，留下了大量珍贵的诗文，形象地描绘和抒发了羊肠坂的自然风光和心情感悟。唐代大诗人李白曾描写古人艰难穿越“太行陞”，浩叹“五月相呼度太行，摧轮不道羊肠苦”。盛唐李隆基在《早登太行山中言志》写道：“清蹕度河阳，凝笳上太行。火龙明鸟道，铁骑绕羊肠。”金代文学家元好问直接写《羊肠坂》：“浩荡云山直北看，凌兢羸马不胜鞍。老来行路先愁远，贫里辞家更觉难。衣上风沙似憔悴，梦中灯火忆团圞。凭谁为报东州信？今在羊肠百八盘。”大有思乡之情。清朝名相陈廷敬途经此地也留下《太行四首》其中写道：“天井关门跨碧空，太行开辟想神功。遥遥绝塞羊肠尽，下视中原虎踞雄。”透出一股浩然之气。

羊肠坂道见证了华夏悠久历史和深邃的文化。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党中央为了增强抗战力量，1939年5月，派徐向前和朱瑞到山东领导敌后游击工作。接到命令后，徐向前在馆陶与朱瑞汇合，于6月上旬从泰安以南过津浦路，进入沂蒙山地区。他们刚到那里，就赶上了日寇对山东发动第一次大“扫荡”。自此，徐向前开始领导山东军民反“扫荡”。

**指挥粉碎日寇进攻**

沂蒙山区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它南临陇海铁路、西跨津浦铁路、北接胶济铁路、东濒黄海，是开展游击战争的好地方，还是山东党政军领导机关的所在地。1939年6月1日，日寇两万余人在植田大将指挥下，兵分十路，分进合击沂蒙山区腹心地带。刚到沂蒙山区的徐向前来不及详细了解山东各根据地的情形，就投入到指挥军民进行反“扫荡”的紧张斗争中。

当时承担反“扫荡”任务的主要是在山东抗日武装起义中发展起来的八路军山东纵队。这是一支土生土长的武装队伍，既缺少战斗经验，又缺乏干部，装备也很低劣。不过，沂蒙山区地势险峻，回旋余地大，部队熟悉地形民情，有青纱帐和群众掩护，为打击日寇提供了便利条件。在徐向前指挥下，八路军山东纵队与地方游击力量、县独立营、自卫团协同配合，相互支援，重点袭击日军的交通线和薄弱地方。日军逼进村庄时，军民空舍清野，埋藏粮食衣物，使敌人进村后粮水无继；或者躲进山洞，使村庄空无一人，日军走后，再互通情报，商量对策，拖得敌人筋疲力尽，难有收获。在一个多月的反“扫荡”中，山东军民与日军作战20余次，歼敌1000余人，最后迫使敌人不得不撤出沂蒙山区，收兵回巢。

**制定新策略消耗敌人**

从1939年下半年起，日寇加大了对山东抗日根据地的“扫荡”频次，使用的兵力规模也越来越大，并且采取把后方变为前线、以“游击战”对“游击战”等策略。针对日寇“扫荡”中的新特点，徐向前制定了新的反“扫荡”策略，即军民合力，运用游击战、破袭战、麻雀战等多种作战方式，不断给敌人以有力打击。

日军不甘心接受山东第一次大“扫荡”的失败命运，妄想把驻扎在沂蒙山区的八路军第一支队消灭或挤出去。1939年10月底，敌人向临朐县城西30华里的五井镇发动了大规模进攻。面对日军的进攻，徐向前指挥八路军第一支队官兵一面用步枪挑着军帽佯装前进以吸引日军火力，一面利用有利的地形地貌，在日军猛烈的火力下匍匐前进，最终将他们围歼在五井镇的莲花山上。这次战斗历经17个小时，毙伤日伪军120余人，被《大众日报》誉为是“山东抗日两年来的最模范的胜利战斗”。

孙祖战斗也是徐向前领导反“扫荡”取得胜利的一次典型战斗。1940年春，日军再次对鲁中地区进行“扫荡”。徐向前根据群众送来的情报，判断日军会经过岱庄，孙祖，正好可以借此伏击歼敌。为此，他星夜调八路军第二支部一部北上埋伏在孙祖与铁峪之间。3月16日，日军几百人果然向孙祖方向前进，正好钻进了八路军的包围圈。当日军进入孙祖附近，正好钻进了八路军的包围圈。当日军进入孙祖附近的九峰山后，埋伏在山上的指战员一齐开火，手榴弹、石块顿时飞向敌群，机枪、步枪也一齐扫射，给日军造成重大伤亡。附近的民众也自动组织起来，运送伤员、送茶送饭、侦察敌情，为战斗胜利提供了重要保证。这次战斗历经两昼夜，毙伤日军200余人，缴获了一批马匹、车辆和武器弹药。

类似的反“扫荡”战斗还有不少，如1939年6月的苗山战斗、7月的大郝家埋伏战、8月的梁山伏击战、11月的泰山反“扫荡”战斗以及1940年3月的白彦战斗、4月的抱犊固反“扫荡”战斗等，反“扫荡”的零星战斗几乎天天都在进行。在领导山东军民进行反“扫荡”的过程中，徐向前沉着坚毅、指挥有方，使日军屡遭惨败，大大提升山东军民的胜利信心。

**发展武装提高战斗力**

基于山东抗战武装力量薄弱的实际，徐向前主张必须发展壮大武装力量。他积极落实党中央要求山东把发展武装力量作为一切工作中心的指示，一方面采取措施发动群众成立民兵自卫团等武装组织，另一方面提高主力部队、正规军的质量。

徐向前提出各县均要组织民兵自卫团，区、乡、村等成立自卫武装力量，担负站岗放哨、空舍清野、侦察敌情、清除汉奸、保卫政权、配合主力部队作战等任务，这为反“扫荡”提供了广泛的人力支援。如在日军“扫荡”泰西时，民兵自卫团员很快组织起来，从家里拿出土枪、大炮、大刀、红缨枪等，在1940年清河区的刘家井战斗中，他们用土炮与八路军战士一样坚守在阵地上；寿光阳河的自卫团单独夜袭敌人，给日军制造了不小麻烦，对于粉碎日军“扫荡”发挥了重要作用。

1940年夏，党中央来电要求徐向前赴延安述职，至此，他离开了和他一起战斗一年有余的战友与山东百姓。他为争取反“扫荡”胜利付出的心血和努力铭记在山东人民的心中。

**红色记忆**